



# 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

( 民国时期 )

汪前进 编选

第三册

西安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汪前进 编  
选.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748-206-2

I. 中… II. 汪… III. 历史地图—地理学史—研究—中  
国—民国 IV. K992. 6-092

中国版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9892号

**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

汪前进 编选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友谊东路334号 邮政编码:710054)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福盛印刷厂印刷

210毫米×285毫米 16开本 121印张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

ISBN 978-7-80748-206-2

定价: 2000.00元

# 地理學家朱思本

內藤虎次郎著  
吳吟譯

原文 見 讀史叢錄

元代地理學家朱思本之名，為學者所習知。據元史地理志後所附關於河源之記事：「翰林學士潘昂霄金石例得其說於河源之探檢者，都實之弟關關出，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自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繪梵字圖畫，證為華文，與昂霄之志互有詳略。」元志列昂霄之志於本文，而以思本之譯文附註其間。由此知思本為江西臨川人，為通梵字之地理學家。其所著有廣輿圖一書，為數百年來中國地理學界之權威。思本之廣輿圖，原本今已不存。明代據之以修訂之廣輿圖則行世甚多。京都帝國大學所藏萬曆七年山東重刻明嘉靖末羅念庵有名學者時，廣輿圖卷首有思本自序：

予幼讀書，知九州山川。及觀史司馬氏周遊天下，慨然慕焉。後發會稽，泛洞庭，縱遊荆襄，流覽淮泗，歷韓魏齊魯之郊，結轍燕趙，而京都實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於桐柏，又南至於祝融，至於海。往往訊遺黎，考郡邑之因革，數河山之名實。驗諸滄陽，安陸，石刻，禹跡，圖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圖，乃知前人所作，殊為乖謬。思構為圖以正之。閱魏鄭道元註水經，唐通典，元和郡縣志，宋元豐九域志，今秘府大一統志，參考古今，量校遠近。既得其說，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士夫，使於四方，遐邇攸同，冠蓋相望，則每囑以質諸藩府。博采羣言，隨地為圖，乃合而為一。自至大辛亥迄延祐庚申，而功始成。其間河山總錯，城連徑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若夫漲海之東南，沙漠之西北，諸蕃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遠絕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詳，詳者又未可信，故於斯類，姑用闕如。嗟乎，余自總角，志於四方，及今二毛，討論殆遍。茲圖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後之覽者，庶知其非苟云。是歲日南至，臨川朱思本本初父自敘。(一)

以此得稍知其作廣輿圖之由來。思本之傳歷自羅念庵時即已不詳，羅氏序僅云朱為撫之臨川人，博學多聞，踪跡徧海內，然考郡志，不載姓名，而絕不及其餘。

然近年烏程張鈞衡所刊道園叢書中所收有貞一齋詩文稿二卷，即朱思本所撰，據之略可得思本之行事。今先割取材料以觀其行履，次及關於輿圖之著述。

貞一稿有至治三年范梈劉有慶及歐陽應丙序，泰定二年虞集序，泰定四年吳全節序，天曆元年柳貫序。其歐陽應丙序云：

本初大父以科舉仕宋，至淮陰幸。

劉有慶序云：

吾友朱公本初，故禮義家。

吳全節序云：

臨川朱本初，儒家子也。

據上所言，可知其家世。又吳序云：

為黃冠，與予同道。居龍虎，與予同山。處京師，與予同朝。雅志詩文，與予同好。

劉序云：

厭世澗濁，竊據畧弁。訪歷名山大川，與太初溟滓，游於無窮。而嗜聖經史，傳諸子百家，若飢渴然。

據之可知其曾入南方道教之中心張天師所住之江西信州龍虎山為道士。明吳寬跋此集言其出家上清宮。范梈序亦稱上清。

朱君與吳跋所言合。

元世祖重道教，至元十三年平江南，召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待以客禮。其後三十七代天師張與棣，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三十

九代天師張嗣成等，歷被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各帝所優遇，其最被信用者為張宗演之門下張留祿其人，初與張宗演同入朝時

稱世祖旨，留主大都（即燕京）崇真宮，命為天師，固辭。後累進，遂至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2）贊化保運，立教大宗師，知

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至治元年年七十四卒。吳全節嗣其道為立教大宗師，後至特進上卿，稱崇文弘道立教真人。吳全節於

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張留孫見世祖，自此遂留大都。朱思本始入大都，在何年不明，據與之交遊最密，詩文頗多之類，  
泰定二年序云：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

或在大德年間三十歲前後時。初師事張留孫，後助吳全節從事管理江南道教，吳全節在成宗朝奉命代天子致祝五嶽四瀆等  
名山大川，思本其後亦屢次受同樣使命。柳貫序云：

比年奉將使指，代祀名山，車轍馬迹，半天下矣。

思本詩稿中亦有如下詩題：

至大四年辛亥，子年卅九。承應中朝，奉詔代祀海嶽，冬十二月還京師云云。

又衡嶽賦序云：

仁宗皇帝踐阼之初元，即皇慶元年思本以外史承應中朝，奉詔代祀。

又遊廬山記云：

延祐三年冬，余行役江淮。

其關於地理學之智識多得之於此時期中。

思本至至治元年張留孫卒時猶在大都。據其祭文教大宗師張上卿文及開府大宗師張公誥可知。其聖治太平宮神龍記有：

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子被玄微，至江州聖治太平宮。

同年范椁序：

癸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間，得君寄詩二章。

同年劉有慶序：

贊主教玉隆，余才江右云云。

之父則自至治二年間住江西玉隆宮，送相師沈無庵序。

秦定改元春暮，訪于玉隆。

則直至此年約在玉隆宮也。又遊廬山記。

秦定二年春三月奉詔其術玄教，思本乘傳，播告江南云云。

此事以後，又入大都佐吳全節，其至江南，特不過為一時播告而已。又詩稿中有：

至顯二年夏五月二十八日自通州登舟南歸。

詩題，其時作發都中詩。

時昔居上京，結交翰墨場。壯志日以舒，歸心已遺忘。重來歐班駘，故舊半存亡。中浩然發幽興，駕言還舊鄉。下

由此可知其居大都前後二次，此時又復南歸。

思本之生卒，據集中詩得知其生年，卒年未詳。

至大四年辛亥，予年卅九。承應中朝，奉詔代祀海嶽。冬十二月還京師，與歐陽翰林同舍守歲，賦詩和東坡龍鍾卅九勞生已。

強半韻。至治元年辛酉，又與歐陽僧留京師。除夕用韻述懷。邇來十年，春秋五十有九矣云云。

此詩序與詩並與序合，即有：

戊辰年臘月，大雪彌旬云云。

序詩：

竭來五十六，老態日夕至。

也。戊辰為天曆元年，上推至至大四年與詩序中所云密合。由此可推定思本實生於元世祖至元十年。至其卒年，無足徵資料，但

吳全節序有

子長於本初四歲

之文。據元史釋老傳，全節卒年八十二歲。是則至大辛亥吳全節四十三歲，至正十年吳全節卒，而貞一稿之詩文無涉及於吳全節之死歟？或朱思本卒於吳全節死以前歟？以此假定其卒在順帝之初年元統後至元間，當無大誤。

思本詩文之才爲當時學士大夫所推重，爲其集作序之處集道園爲元代第一大家，與思本交誼極篤。序中稱：

其治事也，論如議禮，嚴介若持志。立志之學，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於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而託之文章，宜其過人之遠也。

無論已。范梈稱其詩：「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歐陽應內稱：「其年四十餘時，排體五言學工部，長句學文，則馳騁老坡間。」又稱之云：「久之文造於韓，復進於遠。近代十有餘年，其所進方未已也。」明吳寬跋貞一稿亦云：

故元文章之盛，雖方外道流，亦有其人。如吳全節薛玄卿張伯雨輩是已。此則朱本初所著貞一稿，觀其所得，尤爲精深。

則同時學者之稱揚，必非出之於從諛可知。且即思本之所作又毋寧謂爲適於儒家文人喜與公卿大夫交遊者，甚至與之同臭味之吳全節因此對之亦不免頗有微詞。吳序中云：

予自四十來，言語詞章，漸刊落而無爲，非無爲也，吾聞諸教父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今觀本

初示予貞一齋稿，其文皆四十後作，而用志方銳也。用志銳則學日益矣。損與益二者又不可同日語焉。或曰本初其亦良賈之深或者歟！方其處山林也則以損，及升於朝也則以益。蓋山林以道相尚，而朝廷以才學相推長，本初亦不得不資益之道。

以自混其處形，亦孔子齊人之類較也。若是者又豈吾之所望於本初乎！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則本初之志哉。

然思本之長處固不啻在文詞，即其性行，亦有道儒之風。集中有是命者說及答族孫好謙書，詳述反對是命術士之理由，以君子居易爲其主持，又送相師沈無庵序，明言不信相術，甚至一概抹煞前代之被務爲善相者。唐舉許負若人之僞，與歐陽南陽書戒



其筆墨烈與西，其語見超凡類此，非羽流黃冠所能企及，其思想全出儒家。其詩文亦恰如其爲人，有作家之風，無一般如宋之白真人等之道家特色。蓋元明之際，僧家亦如余室與文人作家同一趨向，所作詩文，所謂無莖荷之氣。按朱思本集可知當時道家亦不外此。流似時世風氣使之然也。

試分作三部分論述朱思本之廣輿圖：第一書名，第二其著述之年代，用意及當時之評語，第三後人之引用。

朱思本之原圖，恐今已不存，現可據之最早本即題爲廣輿圖之羅念庵本。然貞一齋雜著所載序文有「輿地圖自序」，且羅念庵廣輿圖序

於是悉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於數十。

由是可知朱思本原本單稱輿地圖，羅念庵增補之際，始改稱爲廣輿圖。

其次，其著述之年代，據前錄自序言自至大辛亥迄延祐庚申而功始成之文，知此書爲思本自二十九歲至四十八歲十年間所成。其原因之形式體製如何，羅念庵序云：

訪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圖。其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舛。

又

朱圖長廣七尺，不便卷舒。今據畫方，易以編簡。

又朱思本自序有

博采羣言，隨地爲圖，乃合而爲一。

之語，由是知朱氏始製爲各地之分圖，再合之爲長廣七尺之大圖，以計里畫方之法，期其正確。

但在中國地圖計里畫方之法，實不始自朱思本，其起始遠在晉代裴秀之禹貢地域圖。禹貢地域圖今雖不存，然晉書裴秀傳曾載其序文。因當時秘書院既無三代之地圖，漢蕭何所得秦之圖，亦已不存，僅有漢代之輿地及其括地稽雜圖，既各不設分率，

又不考正準望於是秀作地圖十八篇其論制圖之體云

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及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易也。有圖象而無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隔絕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清胡渭禹貢錙指引之，加以解釋：

今按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準望者辨正方位，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道里者人跡經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數若干之謂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謂岡壘，下謂原野，方如矩之鉤，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腹九折，直如鳥飛津繩，二者皆道路夷險之別也。人跡而出於高與方與迂也，則為登降曲折之處，其路遠。人跡而出於下與邪與直也，則為平行遷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數，皆以著地人跡計，非準望遠近之實也。準望遠近之實，必測虛空鳥道以定數，然後可以登諸圖，而八方彼此之體皆正。否則得之一隅，必失之他方，而不可以為圖矣。

是則西晉之初已有計里畫方之法，且具滿下方邪迂直之算，比之後世之中國地圖，極為精密。後漢以晉泰始七年（西元二七一年）卒年四十八但近代清馬徵麟謂裴氏十八篇以二寸為千里，實不能詳其有何據。其後唐貞元時宰相賈耽又製計里畫方圖，據新唐書地理志：關海內華夷，廣二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並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古郡國題以墨，今郡國題以朱。

由是知賈耽所撰除計里畫方方法外，其朱墨題字更為後世如王光魯之開史約考，六嚴之歷代地圖等朱墨本地圖之祖。賈耽圖

今雖不存而阜昌石刻禹跡圖蓋存其遺制者。此者為倫齊劉豫阜昌七年四月按阜昌七年即宋徽宗宣和元年十一月三十七年所刻石現存西安碑林中長廣各四尺（日本尺）二尺六寸許，畫為橫七十方縱七十三方，每方為地百里，載禹貢山川名，古代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志，因為有刻，雖不能分朱撮亦可視為賈耽圖之縮本。且在西安有與此圖同時之阜昌七年十月所刻之石刻華夷圖雖不用計里畫方之法，而可推定其為同一人所作。華夷圖之緣邊舉有外夷之國名，中有「唐賈魏公」魏公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等語，則此圖與禹跡圖同出於賈耽無疑。據此則賈耽之計里畫方圖且至宋猶存，朱所見潞陽安陵之石刻禹跡圖建安混一六合圖等與阜昌禹跡圖有無關係，今雖不可得而知，而思本之計里畫方圖之必有所本則可由此推知。羅念庵謂其所為畫方之法，則巧思者不逮也。

又清李兆洛題頁一齋雜著謂：

蓋地圖之計里定方，自思本始也。

似為失考。

思本之作輿地圖亦見范梈序中，而極力稱揚之者則康道園也。其序云：

至於職方之學，尤所徧善。遇輅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逕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時日不厭也。

以此與其自序參看，可見其用心之勤，可知其學在當時已為學者所重。

思本地圖被引為典據之時代垂數百年。羅念庵重輯廣輿圖後經二十年，嘉靖四十年浙江布政使胡松增修琉球兩圖為之刊行。其後數年，嘉靖四十五年韓君恩又為補刊，至萬曆七年錢岱為之重刊，此觀現存羅圖各序可知。至此刊本時猶存朱思本及羅念庵序。其後萬曆三十二年汪作舟刊廣輿考完全刪去朱序羅序以下，可徵朱圖之源流各序，然圖中以朱圖為據之痕

迹仍存，猶不可全掩也。

貞一齋雜著中與地限自序後有北海釋，和寧釋，八番釋，兩江釋四條。五節取釋國中地志之文者也。其和寧釋曰：

和寧即哈喇禾林，乃聖武始都之地。今嶺北行中書省治所，常以動舊重臣爲之。外則諸王星布蒸列，於以藩屏朔方，控制西域。實一巨鎮云。

然遼國有朔漠圖，又載明成祖北征之地名。其原圖出於朱思本之證據，據羅圖。

和寧即哈喇禾林，元初建都於此，名元昌路。太宗建萬安宮，迺堅茶殿。於圖蘇湖迎規殿。後爲嶺北行中書省，常以動舊領之，元之巨鎮也。

之文，僅與朱文互有詳略，其因襲之迹甚明。釋者按四書集成坤輿考第九十八卷與羅圖考五十六元二一大家乙未年城和林城三十餘里一則西歷茶葉殿與羅圖作萬安宮丁酉治湖堅茶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戊戌曾圖羅圖初建置殿去羅圖蓋羅圖置殿非一地蓋明此証有誤而注作舟之廣輿考亦有朔漠圖，關於和寧之文釋與羅圖一字不異，是注圖亦據羅圖至爲顯明。

至明末張祖綬著皇明職方圖，據其卷首所載或問云：

地圖之修，肇於乙亥之春，王正月，越八月而編次訖。丙子初夏而刊圖竣。凡十有六月圖成。則此圖成於崇禎八年九年（西元一六三五——六）間，著者於或問中聲辯其雖仍羅念庵廣輿圖之舊而所以改定書名者，

由其與羅圖不同廣，謂廣輿圖所載北不及和林，南不至交趾，東不及日本，西不抵絳皮，又謂著者已見利瑪竇之萬國圖，而對於所謂五大洲者則存而不論，所載僅限於明之職方司所司區域，其實廣輿圖所載之朔漠圖依然收載其中，且其關於和林之文釋與廣輿圖廣輿考全然一致。

以上爲余所見之古地圖關於朱思本地圖之系統者，此最後所成之職方地圖，實在思本成圖三百十六年後，其用爲輿地之痕迹始得辨之甚明。余於清初之地圖未加研究，恐至由耶穌會宣教師之手所成之康熙內府地圖時，廣輿圖始不流行也。

但在朱思本圖成後，仍有不屬於其系統之其他地圖流行亦歷然有證。西本顯寺所藏明建文二年製鮮所製之一圖，會見明代之地名，而大體依據元代之地圖甚明顯。小川如舟博士等謂其製圖之法與載於元史天文志西域圖志中苦來木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者符合。然此圖與朱思本圖，余研究至今尚不能發見其有何等關係之痕跡，因之不能不假定為同時代所流行之不同地圖。

參考

至元十年（西元一二七三）大德元年（一二九七）至大辛亥即四年（一二三一）皇慶元年（一二三二）延祐元年（一二三四）至治元年（一二三二）泰定元年（一二三四）天曆元年（一二三八）至順二年（一二三一）元統元年（一二三三）後至元元年（一二三五）至正元年（一二四一）延祐庚申即七年（一二三〇）皇昌七年（一二三七）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萬曆七年（一五七九）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建文二年（一四〇〇）

附註

(1) 廣輿圖之首所載朱思本之自序，與貞一齋雜著所載者往往有異同。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圖作惟川混一六合郡邑圖，秘府大統志作皇元一統志，詳者又未可信，未有必字。此其著者，其餘小異從略。

(2) 張留孫之賜號據元史釋老志及貞一齋雜著中開府大宗師張公諱祭文，祭文致大宗師張上卿文，補成二字作補相。

附記

據近時印行圖際之好古堂書目地理部有

輿圖元朱思本 大本一本

然則朱思本之原圖至康熙間猶存也。

譯者跋尾

內藤湖南先生此文先連續刊載於大正九年一月發文第十一編第一二號。上篇考朱思本行歷，下篇論輿圖記辨正李兆洛氏以計里查方法為始於朱氏之非，及其源流版本。昭和四年收入所刊讀史叢錄。其考朱思本行歷一據適園叢書本頁一齋稿。投繯討索，朱氏之學行粗具。

按湖南先生據頁一齋稿與地圖自序及羅洪先廣輿圖序，當定朱氏原圖名與地圖，經羅氏增廣，始改稱為廣輿圖。考千頃堂書目卷六有羅洪先廣輿地圖四卷，卷六卷八並載有

朱思本廣輿圖二卷 臨川人

則羅圖改名原為廣輿地圖，卷六卷八所錄之本，疑經後人妄改，致與原名不符，或經羅氏增廣本，偽為朱氏原本也。此據明史藝文志一羅洪先增補朱思本廣輿地圖二卷一及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

增補朱思本廣輿圖一册 明羅洪先撰

與黃目所差，不過落去「增補」二字可知。

頁一齋稿之見於著錄者亦始於黃氏，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九

朱本初頁一稿

臨川人。從吳全節宗師居大都，教祀名山。所著考求地理作地圖考，多有虞邵庵、范德機、柳道厚序。

其詳述朱氏與歷造就者，則始於阮元，其所輯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卷五云：

頁一齋詩文稿二卷

元朱思本撰。思本字本初，豫章臨川人。常學道於龍虎山中，頁一其號云。湖湖立元詩四集，稱思本嘗從吳全節居都下，博洽文雅，見稱於時。所著詩文稿世無刻本，僅存范梈、劉有慶、歐陽應丙、虞象、柳貫及全節六序，俱諸人手書，蓋吳中劉損夫家。此本乃叢書堂吳克手鈔，凡二卷，上卷為雜著文，下卷則古近各體詩。思本好學遠遊，遍歷名山大川，幾半天下。嘗以昔人所刻

禹迹圖、六合記邑圖，皆有乖謬，乃參閱鄞縣九域一統等志，考訂古今，校量遠近，成輿地圖一書。計里開方之法，至思本而始備。今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一篇可證也。大約思本之學，地理為長也。

所言「計里開方之法，至思本而始備。」正與內藤所考若合符節。其言稿本源流，亦足補內藤所未及。翟氏磁琴銅劍樓亦收錄此書，藏書目錄卷二十二。

貞一齋雜著一卷詩稿一卷 鈔本

元朱思本撰。思本字本初，江西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從張仁靖真人，歷直南京。又從吳全節居都下。後主席玉隆萬壽宮。嘗以周遊天下，考覈地理，竭十年之力，著有輿地圖二卷，刊石於上清之三華院，惜今不傳。集中有自序，可見其概。卷首有臨江范椽、眉山劉有慶、臨江歐陽應丙、蜀郡虞集、元教大宗師吳全節、東陽柳貫序。是書世無刻本，諸家書目，亦乏著錄。此從藏書堂鈔本傳錄。

言朱氏輿地圖曾勒石上清，亦為內藤文所未及。其他藏書家著錄是書者有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目卷十六。

貞一齋詩文稿二卷 元朱思本撰 鈔本

思本之學久湮失，數百年來雖經黃阮、丁諸家之著錄傳鈔，烏程張氏之刊行遺稿，然于其學問創獲，人品行事，尚無有系統之表揚。內藤先生此文發潛表幽，使數百年前之學者得復現音容于今日，使後學者得稍悉其學問原委，厥功實多。爰於課暇逐譯為華文，并以所知附錄于後。

一九三三三月十六日吳陰于清華

# 利瑪竇傳

(原文見歷史地理卷二十六號三、四。又續編見卷二十九號三、五；卷三十號一。)

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有李佳白者 (Dr. Gilbert Reid) 久居於上海，號其室曰尚賢堂，頗通中西政教事理。曾著中外聖賢事蹟叢談一書 (西曆一九零八年上海發行)，中國人中選孔子，朱子，清康熙帝及會國藩四人，西洋人中選馬可波羅 (Marco Polo)，利瑪竇 (Matteo Ricci)，戈登 (Gordon) 及蕭安仁 (美國駐華公使 Anson Burlingame) 四人，爲作評傳。其紀利瑪竇事多據西籍，似未留意於中國史料。今予根據漢文史料，旁參日本書籍，以傳利瑪竇之一生。苟於東西交通史上稍有裨補，則大幸已。

自明嘉靖三十一年 (西曆一五五二年) 中國耶穌會衆所謂泰西聖人 範濟各沙未爾 (St. Francis Xavier) 客死於距廣東不遠之南海之上川島後，約三十年，而生於蓬木利馬西勒太 (Macera) 之利瑪竇抵當時西洋人在中國唯一根據地之澳門，時萬曆八年 (西曆一五八零年) 也。利氏時年二十九，其生年恰當沙未爾之死年——一五五二。

中村久次郎著 周一良譯

粵至廣東肇慶府，時兩廣總督駐焉，受總督郭應聘等之款遇頗厚。遂築室而居，宣傳天主教。利氏有傳教內地之意，乃赴廣東省北部之韶州府。利氏初着僧服，至萬曆十九年始改儒服。後又至韶州府東之南雄州，是處爲士人所敬愛。留南雄州數年，遂入江西省，至臨江南昌二府。其游南昌府也，建安王嘗賓禮之。

自萬曆二十年日本豐臣秀吉征朝鮮後，神宗恐日本軍之侵入中國，召諸大臣至宮中議軍國事。時有一遠官與利氏相親善，欲借赴北京，利氏之得自廣東入江西者以此。途中曾遇破船之厄，幸免於難，然此後二人遂不復如前之相得。蓋當時明與日本交兵，遠官恐與外國人同行之被嫌疑，遂不借至北京，抵南京即留利氏焉。然前此南京未嘗居留洋人，故利氏亦不能久居，重返南昌。利氏得安堵於南昌府，其信仰學術獲得南昌人士之注意，且受知於建安王等，疑其名漸達於宮廷即由是也。利氏遂入北京，卒以明日之戰事未了，利氏竟被誤解爲日本人，不得已復南下，從事於浙江省方面之布教事。



業。既而又至南京，時豐臣秀吉已死，日本諸將皆離朝鮮返國，於是大安明人之心，而南京士人亦無復挾疑於利氏者，始獲安居，與士人相交往焉。利氏往來南京蘇州間，布教之外，兼盡力於新學之介紹，益得明人之信任。萬曆二十七年建立一會堂於南京，利氏居於南京正陽門外之西營中，見清張庚國朝叢書錄卷中焦乘貞條。

自是利氏名望漸高，萬曆二十八年許之入京，遂與西班牙人龐迪我 (Didace de Pantoja) 等八人携貨品出發，途中有中官馬堂 (西洋人稱 Mattan) 等為之斡旋，於西曆一六零一年 (萬曆二十九年) 正月四日再入北京。晉謁神宗，上書自稱「大西洋國人」，述其履歷，並獻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二本，珍珠鑽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神宗嘉納之。

時禮部官吏中有以明會典無大西洋國名，而疑利氏之言者，且謂既在中國二十年，則不能視為遠人來貢。又以為所貢天主像等皆屬不經，指斥其所携「神仙骨諸物」云：

「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所獻者所謂凶惡之

物，不宜入宮禁者也。」(明史外國傳大里亞條) 而排斥之。然神宗嘉其遠來，賜以邸宅等，遇之甚優渥。且許建立天主堂及譯經布教，又使從事於測量算術書表之著述，及天文器械之製造。朝廷公卿以下重其人，皆與之交，利氏安焉，遂留而不去。

利氏之賜第在北京城西南都之宣武門——一名承順門——內之東，天主堂則在其第之左。此即今宣武門內南堂之起源，今南堂之壯麗建築乃經同治元年 (西曆一八六二年) 大修理者也。

由是西洋耶穌會士踵至，分別布教於各省，而萬曆三十四年來華之義大利人熊三拔 (Sabbatino de' Delle) 則居北京助利氏布教。利氏之事業日有進益，而竟於三十八年 (西曆一六一零年) 三月十八日病死，享年五十九，上下莫不悼之。葬以四月二十三日賜墓地於北京城西都之阜成門——一名平則門——外，且建堂宇以祀天主。是年十月葬焉，神宗勅使臨之。順天府屬京兆人王慶麟以素與利氏友善，特為撰碑文，載在正教奉褒上卷，為中文叙利氏經歷之簡明者。

利氏墳墓在阜成門外二華里楊村 滕公 欄兒，今法國